

航海史 水运史编史学习参考资料

史论选编

第一辑

航海史研究会编

一九八九年四月

史 论 选 编

第 一 辑

航 海 史 研 究 会

目 录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框架.....	林庆元 (1)
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陈 锋 (13)
关于历史认识的思考.....	吴怀祺 (21)
史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	魏承思 (31)
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	罗尔纲 (38)
论写文章.....	赵光贤 (48)
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肖 黎 (52)
货殖是历史的必然	
——学习司马迁《货殖列传》札记.....	顾康祖 (66)
略谈西汉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障作用	
.....	刘长林 (72)
略论郑和的军事才能.....	孔令仁 马光汝 仲跻荣 (83)
对马克思关于中国“闭关自守”问题的提法及其	
有关问题的研究.....	严中平 (90)
略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汪敬虞 (121)
福州船政局与帝国主义.....	孔占元 (145)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滨 (154)
试论“官督商办”在民族近代企业发生时期	
的积极作用.....	黄 磊 (168)
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外部和内部因素.....	吴承明 (180)

1840—1949年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 (美) 邓伯格 (190)

“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

研讨会述要..... 杨 声 (221)

中外学者关于“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

化”的学术论点..... (227)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框架

林庆元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框架问题，直接的涉及中国近代史的主轴、线索以及联结点。

中国近代史主轴是什么？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考察一下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此，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演变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一种总趋势。但这种趋势，在中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了变化，它发展的趋势已不是旧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但按其性质来讲，“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可见，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不管在那一阶段，都贯穿于近代历史的始终。但是，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就出现了一种与之相反的趋势，即列强和封建主义势力反对在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逆向趋势。这种顺向趋势和逆向趋势，贯穿于中国近代史始终，表现在近代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第506页。）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经济条件，既决定上层建筑，又贯穿于发展进程的始终，并使我们理解历史进程的原因，一切上层建筑由此得到说明。就拿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过程”来说，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其根源在于列强在经济上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与支配。不说明列强经济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以及没落，就不能深刻地阐明中国殖民地化过程的内在发展规律，当然也就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还应该指出，当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形式向中国扩张时，中国的主权就受到损害，关税失去独立性，司法权受到侵犯，中国面临着瓜分危机。资本输出要求投资范围的独占与排他，于是出现了列强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澜，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地加深了。

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状况和结局，也同样可以从中国近代经济状况中得到说明。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代表，但它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的产物。它的基本要求是要把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变为符合农民愿望的小农经济所有制，这种要求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围，也不会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推进。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什么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任务？基本原则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特别缺乏近代大工业的基础。据统计，到1920年中国近代工业产值不到工农业总产值的5%。在这种情况下，清王朝不必依赖民族资产阶级提供的赋税，而主要依靠封建的土地税与帝国主义提供的海关税。因此，中国资产阶级缺乏反对清王朝的有力经济武器。此外，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微弱，加上资产阶级的不少前身是封建地主，这很难使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要唤起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热情是需要较长时间和更多条件的。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对袁世凯这类封建主义

代表人物的妥协，当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表明，在落后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很难产生民主意识与近代化意识。这种土壤所滋生的必然是民主其名，专制其实的政治。它促使人们对中国近代经济基础的历史重要性，进行深刻的反思，进一步认识并把近代经济发展的趋向放在主轴位置上来考察。我们把民族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与斗争、消长，作为近代史的主轴，是符合中国近代史的实际的。只有这样，才能深刻而清晰地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上升与下沉、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革命与反动的矛盾对立这种总趋势。

当然，这不是说只有主轴才是决定近代社会发展的唯一力量，也决非把其他方面看作是这根主轴的被动反映。相反，它们之间是相互交叉，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我们可以在这根主轴上建立多视角多层次的中国近代史的主体。

二

围绕这根主轴，可以有许多平行发展的线索。这些线索构成近代史的脉络和层次。例如：

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它通过鸦片战争、三元里反英斗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反洋教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卅运动、抗日战争联成一条线索。

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封建斗争。这种斗争几乎贯穿于整个近代。它自太平天国始，大小农民暴动遍于中国大地。七十年代后，幼小的中国工人阶级也以自己的英勇斗争谱写了反帝反封建的新篇章。二十世纪初，遍及全国的反封建斗争形成另一高峰。不过，他已不成为历史的主角，而从属于资产阶级革命。

爱国维新学西方和卖国、闭关，构成另一线索。洋务运动虽然是统治阶级内一部分人发动的，但仍不失其进步性，有利于资

本主义的发展。继此的变法运动表明资本主义道路正在成为有识之士追求民族自救的一种方案。民主与民族独立也成为近代的主要课题。

与此相联系，在观念形态上，则表现为西学与中学之争，洋务运动的技艺与人心之争，维新运动的进化论与“天不变道也不变”之争，学西方与闭关之争，民权观念与专制君主思想之争，都反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文化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民主革命思潮，以三民主义为代表更集中地反映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它发展到五四运动则为民主科学与专制迷信之争。五四运动以后则表现为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形形色色的反动文化之争。

中国近代史经历了清王朝、孙中山的南京政府、袁世凯、段祺瑞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政权更迭。除了孙中山短暂政权外，这些政权所具有的买办性与封建性是不容怀疑的。但这些性质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起了那些变化？如何变化？此外，这几个政权无疑是反动、腐朽与黑暗的，但对它们的一些政策与措施，不能因政权的反动而不作具体分析。

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萌芽和近代工业的发展，都意味着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但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却顽固地存在，并且严重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以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独立发展，形成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但是，这种形态是过渡性的，以民族资本主义为一方与封建主义经济、外国资本主义为另一方的矛盾与消长，构成了近代经济发展线索。国民党当政后，中国资本主义分化为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封建经济继续存在，外国资本比重明显下降，但能量很大。不过，这条线索仍然若明若暗。如城市资本主义与农村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这条基本线索是着眼于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不是革命斗争或政治运动的起伏。道理很简单，只有渐进

的社会形态演变才能构成线，而革命斗争只是点。

那么，近代史上的政治运动、革命斗争与基本线索的关系是什么呢？可以说，它是联结线索的环节，是线索发展过程的标志。这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立宪运动、路权运动、抵制洋货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此同时，列强的一连串侵略战争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活动，列强的商品倾销、资本输出与划分势力范围，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活动和反动措施，构成这些点的另一部分。

我们从上述简单勾划的轮廓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应是主轴、线索、点构成的主体的多层次的多视角的历史。而近代经济发展，应当成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红线而加以表述。

我们为什么不用“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四个阶梯”来作为近代史基本线索呢？上述几种说法，无论那一种，都着眼于政治事件或者革命斗争，而抽掉了有决定意义的经济基础。显然，按此编写中国近代史就很难写成一部近代通史，而只能是政治史或革命史。即使有的同志在写中国近代史专著时也注意到经济，但也仅作为政治史或革命史的背景来表述，很少作为一种研究的客体来看待。

三

中国近代史上，有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除了地主阶级之外，他们都在各个阶段扮演着时代中心的主角，起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作用。

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充当主角的时代。这期间，中国资本主义虽然产生，但资产阶级仍缺乏独立的力量和阶级意识。维新变法仅仅是由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依靠君权发动的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它不是由资产阶级本身发动的。因此，农民阶级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

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以及义和团运动等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都显示了主力军的作用，但他们不是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所以不可能提出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纲领。

从1900年义和团失败到五四运动，则是资产阶级为中心的阶段。这时资产阶级已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具有较自觉的反帝反封建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意识。尽管劳动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然而指引历史前进方向的已是资产阶级。所以它们从属于资产阶级，并带有较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色彩。

这里还牵涉到对民主派和立宪派的评价。过去一般认为，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的上层，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不愿革命，民主革命派则代表资产阶级的下层，主张民主革命，这种说法不尽符合实际，中国绝大部分资本家都是从商人、官僚、买办转化来的，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事实上，立宪派在二十世纪初的活动，正反映中国资产阶级和西欧资产阶级先辈们所走大体相同的历程，即都必须有一个和平争取政治权利的时期，也必须有一个矛盾激化时期。可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软弱，他们与封建专制制度与封建经济结构还不是处于绝不相容的地步，他们还需要一个准备时期。而民族危亡，使敏感的具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超前地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与清政府决战。可是整个资产阶级还未从思想上、物质上准备好这场关系本阶级命运的决斗。这样，二十世纪初的舞台上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势；由资产阶级组成的立宪派进行和平的“立宪运动”，而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派则迫不及待地准备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以往人们把立宪派列入反动阵营，这是不客观的。作为立宪派理论巨子梁启超曾提出“君主无责任”论，主张成立“责任内阁”，这种内阁对国会负责，而不对君主负责。他还说，“使得举立宪之实者，则将来

政权所趋，其必成为英国式之政党政治”。（《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可见，立宪派的政治目标与革命派基本一致。立宪派与西欧资产阶级先辈一样，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与封建主义决斗的征途，只是还未达到决战的程度。但它发动的立宪运动，也是为民主革命做准备的，是辛亥革命的准备阶段。所以立宪派的斗争也不同程度有利于历史的前进。

从1919年到1949年，是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的中心。它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是这个时期的主流。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人民群众的敌人。

近代地主阶级虽然不是时代的中心，而且是人民的敌人，但它仍可以分为各个部分、集团与个人，其进步与反动，则应当根据近代的社会特点确定。

什么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特点？特点很多，但有一点很显目，就是发展线索存在着两极的对立，即互相斗争的发展趋势。总的表现为资本主义向上发展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向下沉沦。具体表现的方面则很多。如：侵略与反侵略的趋势；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守旧与革新；专制与民主；独立与附庸；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经济、封建经济；爱国与卖国，等等。总的可以说，是新与旧的斗争，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质与新质的斗争。因此，我们应当从新与旧的对立，历史进步趋势与反动趋势的大层次出发，去评判近代地主阶级的变化及其地位。

这里所谓的社会进步趋势，决非是一种笼统的提法，指的是生产力的进步。恩格斯说：“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共产主义原理》。）在近代中国，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近代工业的出现，无疑是旧质中的新质，是破坏旧质的力量，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任何阶级，只要有利于新质的积聚，都应予肯定。

近代地主阶级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民族资本主义冲刷下，剥离下来的事物与人物，应当是一种与旧质对立的新质。封建官僚、地主、买办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创办近代工业，都是历史的进步。我们应当用此历史的眼光肯定洋务派创办的洋务。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从发生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历几百年，为什么无法向近代机器生产阶段飞跃？当然一部分原因是独立地研制一种机器需要很长时间，更主要的是封建地主顽固派对任何发明创造视为奇技淫巧加以扼制。如果不是握有实权的洋务派第一次冲破顽固势力的阻挠，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恐怕要推迟好多年才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与其说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客观上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毋宁说是洋务派促使中国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呱呱堕地。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是在封建社会里的新事物，是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质相对立的。这就是历史的进步性。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近代社会互相交错、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整体（旧质）中，分析出新质和符合历史发展的事物，并以此为标准，从总体上肯定洋务派和洋务运动。

有的同志为了论证洋务运动是反动的，便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勾结的事实中得出洋务运动是勾结的产物。我们认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互相勾结，并不等于洋务运动也是两者勾结产生的。事实表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也有一个过程，而在这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控制，所以洋务运动应当是反控制的产物，而不是勾结的产物。这可以说明，近代两种不同发展趋势中，洋务运动是与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同方向的，并且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梯，一种途径。

对洋务派的评价就更复杂。近代史上，并没有洋务派的称谓，与其说存在一个明确的洋务派不如说存在一种洋务思潮。这个思潮的特点是：（一）主张革新，反对墨守成规，但这种改革只局限于经济领域某些环节，主要是主张使用机器生产；（二）

鼓吹“西艺”致富求强；（三）主张对帝国主义保持“和局”所谓“明示和局而阴为备战”。他们看到这种数千年未遇的强敌，只能从洋务运动入手，增强实力以消除侵略，而要增强实力就必须与列强保持“和局”。对前两点的评价，史学界没有多大争议，其进步性是明显的。但对第三点，人们看法就不一致，有斥为投降妥协路线。但仔细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避免与列强开战，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不能笼统斥为投降主义。因为它是一定时期内“自强”所必须的客观环境。至于指责洋务派不反帝，那是苛求于洋务派，就连抵抗派左宗棠也承认：“于此而欲变已成之局（即半殖民地的局面）”“不但海疆将军，督抚难得其人……事力亦断不及”。总之“时有未可，势有未能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九，第52页。）可见，洋务派的历史作用，并不表现在反帝方面，而是表现在对近代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上。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为民主革命做了量的积累。我们当然应从社会进步趋势方面去评价洋务派，肯定这股政治力量也是进步的。

洋务派作一个总体，根据上述几个方面，包括关于他们的外交思想，都是合乎历史实际的。但这个派别的个别人，甚至代表人物，他们的活动，与这个派别的活动既有共同点，也有其特殊性。例如李鸿章，他与左宗棠都同样不想改变半殖民地现状，也希望避免战争，在没有战争的环境中“别图自强”。但当列强把战争强加于清廷时，左宗棠立足于战，而李鸿章则出卖民族权利以“保和局”，这就有爱国与投降之分。但李鸿章的投降活动与洋务派并没有必然联系，而清政府的外交路线，也不能认为就是洋务派的外交路线。因为洋务派保和局是正确的，不抵抗则不是洋务派的共同原则，象李鸿章这样的人在洋务派中是很少数，大多数是爱国的。所以，对洋务派的评价也必须对每个人的活动进行分析，但在总体上对洋务派应予肯定。过去我们只用一个

层次，即反帝反封建的层次要求古人，简单地划分为革命阵营与反动阵营，这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认为，除了以反帝反封建作为标尺衡量古人之外，上升与下沉的对立趋势，同样是衡量古人的标尺。洋务派创办近代企业，就意味着他们向旧生产方式告别。所以洋务运动应该是资本主义发展线索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框架问题。在轴心、线索、点勾划出来之后，还有近代史分期问题。分期的标准应当是社会性质和时代中心的结合。据此，第一阶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逐步形成，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以农民阶级为中心的反帝反封建时期（1840—1900年）；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矛盾加深和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时期（1900—1919年）；第三阶段是官僚资本、外国资本、封建主义对民族资本和人民群众的压迫和无产阶级领导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期。（1919—1949）这时期与前两个时期所不同的，只是无产阶级为成主角，而主轴并无变化。

当然，这样的划分，只能从大体趋势来说，其实每个阶段都不是一刀切的，而是互相交叉的。例如，在自发的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时期，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法运动。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是一种过渡形态社会，新旧并存，新旧递变十分突出，所以它的分期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标志。

四

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来研究历史，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的问题是，“两个过程”是不是毛泽东确认为研究中国近代史必须遵循不移的“基本线索”？这是可以讨论的。通读毛泽东著作，他丝毫没有把“两个过程”当作基本线索的意思，以后我们也未听到他把它宣传为近代史基本线索，他更不是想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全部内容。毛泽东只是在当时总结

某些历史经验教训时谈到中国近代史的某一方面，时而这方面，时而那方面。并非全面概括。如：“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是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百年来的革命运动”这一节时的概念。而文章第一章第三节则全面论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着重从经济形态上说明近代社会的演变。可见，“两个过程”只是侧重于革命史方面的概括。事实上，毛泽东多次使用“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史”的概念，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反对中国独立，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中国近代史”，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驳斥资产阶级专政，阐明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是因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一历史环境而加以强调，并非这些内容就是近代史。毛泽东同志在另一处说：“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文章目的在于驳斥艾奇逊所谓辛亥革命是西方新观念传入产生的，指出辛亥革命是对西方反抗的产物。在这点上对上述内容加以强调，所以也不是全面概括中国近代史全部内容，更不是为了作为基本线索而提出的。既然是侧重于对某一方面的强调或概括，当然不可能包括也不必包括中国近代史全部内容。有些同志认为，所有近代发生的事件，都可以概括在这两个过程之中，认为“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两个过程’题中应有之义”，即认为包括在两个过程之内。可是毛泽东说的却是：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

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里所表述的仅仅是革命与反革命，侵略与反侵略的中国近代政治方面的内容。宣布这些内容为基本线索，是后来学者的意思，要把近代史所有内容都作为它的补充和概括，更是后来学者的一种想法而已。由此可见，如何正确与严格区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一般词句，在史学界仍存在不少混乱。而只有严格予以区分，才能发展马列主义史学，因此，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反对摆脱马列主义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倾向，同时也应允许就马列主义作家对历史某些认识而得出的具体结论进行严肃的讨论。

（原刊《福建论坛》1988年第2期）

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

究中的作用

陈 锋

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或非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史学家对心理历史学的评估和争执，主要归于两个症结：一是心理历史学是否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二是心理历史学的功用到底如何？

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发展很容易在有意无意中走向两个极端。起初，在心理分析出现渗入西方各个文化领域的势头时，弗洛伊德本人似乎亦迈入了矛盾的境地，他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一方面审慎地声称，在运用心理分析研究人类文明的诸形态时，“绝不会遗忘由此产生的种种现象的复杂本质”，亦即说不会脱离社会背景和实际；另一方面，他又夸大其词地标榜：“我可以肯定地说，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起源都系于伊底帕斯症结上，这正和精神分析的研究中认为相同的此症结构成了心理症之核心不谋而合。”（《图腾与禁忌》第四章，杨庸一译本）简言之，心理分析在阐释社会问题时起主导作用。这未免显得过分偏颇。尔后，弗洛伊德越走越远，在他著名的《集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文中，甚至声称：“社会的东西归根到底都可以根据集体心理学进行解释。”这种偏执的观点以后又为弗洛伊德的继承者们所继承。美国最活跃的心理历史学家之一莫泽曾断言：“历史中的变化的主要力量不是工艺，不是经济，而是由于父母和子